



## 总体性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李佃来

**摘要：**卢森堡和卢卡奇在运用总体性的理论方法来考察马克思的理论时，从中开显出了政治哲学的理论逻辑。在卢森堡的启示下，卢卡奇提出总体性，旨在审理实证主义理解“现实”与“事实”的方式。在此过程中，通过抗拒实证主义而展现出对政治价值的追求，尤其是布洛赫所说的那种链接于价值判断或理想追求的“希望”的东西，在总体性的结构中得以显现，政治哲学由此在总体性视阈中“出场”。在卢森堡和卢卡奇总体性理论话语之背后，我们发现了通往马克思总体性以及政治哲学的一条思路，总体性对政治哲学的开显，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十分真实地发生了。

**关键词：**总体性；政治哲学；卢森堡；卢卡奇；马克思

在近期的学术研究中，笔者主张根据“从后思索”的逻辑，通过阐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来开显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这条通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路径可以在多种视角上进行清理，而“总体性”就是其中之一。总体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统摄性方法论原则，将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解读马克思的思路连接起来，无论如何都不会产生疑问，但将它与政治哲学，尤其是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连接起来，听起来似乎不太可信。然而，一个饶有趣味的情形是，有些表面看上去是“政治哲学”的问题，并不一定与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有什么瓜葛，说不定只是政治社会学涂染上了一些“政治哲学”的色泽而已；有些表面看上去不是政治哲学的问题，反倒链接到真正的政治哲学上去了，或者本身就已经是政治哲学的问题了（在这里，我们没有对政治哲学作一种硬性的、形而上的指定，我们只是从人们所遵从的政治哲学的通常意义上来说的），总体性就是属于这种情况。我们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总体性及其延展开的理论逻辑，把马克思思想中那种不同于自由主义、也有别于其它意识形态的政治哲学复现出来。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构成了一条通达马克思哲学之“内质”的重要理论道路。

### 一、卢森堡的启示：整体性辩证法视野的开启

首先明确地用“总体性”来解释马克思哲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卢卡奇。但对这一范畴的考察，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来说，不应当遗忘卢森堡的理论贡献，因为卢森堡是马克思之后第一位用“整体性”辩证法的视野来理解马克思以及资本积累的理论家。卢森堡的思想影响到了卢卡奇（以及柯尔施），以至于在精神气质和理论实质上，他们多有一致之处。卢森堡曾说：

马克思有一把有魔力的钥匙，这把钥匙使他揭开了一切资本主义现象最深奥的秘密，使他能够轻易地解决了连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大师都没料到其存在的问题，但是，这把钥匙是什么呢？这不是别的，就是把整

个资本主义经济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来理解,并且不仅是往后看,像古典经济学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懂得的那样,而且还往前看,不仅看到自然经济的过去,尤其看到社会主义的未来。马克思的价值学说、货币分析、资本理论以至他的整个经济学说体系的秘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性,它的崩溃,因而也就是——这不过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一开始就以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也就是用历史的观点去观察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他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象形文字,正是因为他把社会主义的立场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出发点,他反过来才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sup>①</sup>。

在这段话中,卢森堡无疑就是在“整体性”的视野中理解马克思的,这是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她看来并不是两种互不相干的理论,相反,它们构成了一个缺一不可的理论整体。所以,卢森堡指出,当马克思审理资本主义经济时,他理所当然地要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整体意义上,从经济和政治相结合的层面上去进行。也就是说,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经济当作一个整体的历史现象来看待,而不是仅仅从某一个固定的节点来对之加以把握。这种“整体性”的理论方法,正构成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实质性内容。马克思也正是由于运用了这样一种辩证的方法,才在经济学的研究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分道扬镳。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没有将自己的理论认识置放到一个整体的构架当中,没有以一个未来预设的目标来批判地审看现实的经济现象,即他们不会“向前看”,看不到社会主义的未来,而只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既定事实出发,最后也还是要回到这样的事实,论证这些事实的合法性。与马克思“整体性”的理论方法相比,这是一种十足且无味的“非整体性”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哪怕是在最为直观的意义上,我们在这里也可以从卢森堡的论述中,开引出政治哲学或者与政治哲学紧密粘连在一起的理论取向。这是为什么?

首先,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探究,虽然声称建立在对经济现象“客观”分析的基础之上,但其经济自由主义的立场却假定,现代社会经济体系的基础是个人主义,每一个人都会根据自己利益的需求从事经济活动。所以,他们并没有打算触动现代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相反,他们是以证明这样的制度为前提进行研究的;他们并没有打算在历史性的视阈内探询经济活动之未来的政治内涵,他们只是呈现了由经济现象背后“看不见的手”所掌控的当下的政治性——市民社会的政治性<sup>②</sup>。于是进一步论之,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叙事,在范式上与马克思批判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正相通约,或者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料到其存在的问题”,也正是洛克以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要加以解述的问题。如果说,古典经济学之研究在此意义上可被视为一种隐性的政治哲学理论路向,那么,反其道而行之的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由于以“整体性”克服了“非整体性”、以“历史性”克服了“非历史性”,因而从中导出的那种理论逻辑,不仅在实质上可被辨识为一种政治哲学的逻辑,而且这种政治哲学因为在整体性的理论框架内获得了一个“制度之迁变”的思想依托,故此在规范和价值导向的意义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古典经济学远远不可与之比拟。马克思轻松地解决了古典经济学家“没料到其存在的问题”,根据或其内缘即在于此;而那些“没料到其存在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批判的过程中所发现的那些事关革命实践的政治性问题。

其次,卢森堡指认的马克思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在“整体性”与“非整体性”上的分界,从卢森堡同时代的思想语境来看,也是辩证法与以实证主义形而上学为标志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分界。实证主义大行其道的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马克思的理论就已开始被人为地切分为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学

①《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7页。

②为了避免理解上的歧义,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在市民社会的理论史上,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在现代市民社会概念——在经济意义上、指涉到经济生活样态的社会结构——之酝酿与提炼的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经济活动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行为,可以不受政治活动的干预,它有自己的内在法则,遵循着自己内在的、客观的规律,这就在实际上把握到了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性存在,在理论上也孕育了后来黑格尔界定出的那个不同于政治国家的市民社会的概念。对于黑格尔来说,他能够在学理上提出一个明确的市民社会概念,并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界分开来,与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及此种理论所指认的历史事实的研究与考量是分不开的。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呈现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并不是指他们将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指认的那个“旧的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展示出来,而正是指他们把祛除政治性质的市民社会之历史生成的政治哲学意义道说出来。

说这样三个互不相干、各自为论的领域,这在那些持守经济决定论、物质决定论的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甚至在并非拥戴决定论的伯恩斯坦那里,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佐证。这一阐释马克思理论的定式,由于肢解了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的思想表达,所以,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研究变成了一种对纯粹客观的经济规律进行探询的理论实践,使哲学研究变成一种空悬于历史上方的物质本体论绘制,使社会主义的理论求索与一种政治学或政治社会学直接结为一体。这种以“非整体性”的方式来观察马克思的理论镜像,根据卢森堡的理解,形成的只能是一种对马克思思想的错误认识,因为“马克思的思想作品之所以具有这种不寻常的作用,不仅是他本人的天才,而且也因为他始终按他所论述的一切问题之间的最重要的辩证关系,从最全面的历史观点去阐明它们”<sup>①</sup>。也就是说,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不同学科的问题进行分门别类的指认与论述,相反,哲学、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之理论在他那里通过一种辩证关系相互盘结在一起,将任何一种问题从一个思想整体中分离出去,造成对马克思理解的偏颇、简单、贫乏、空疏,都将不可避免。从政治哲学之切关性上来讲,将马克思的理论分解为几个独立的部分,无疑看不到马克思对哲学的创造是在一种资本批判的历史语境下发生的,看不到马克思的哲学乃是因为被他赋予了一种阶级政治的内涵才显得卓尔不群,哲学在此情形下只能被标指为一种“去价值性”、“去政治性”的理论,它与政治哲学是全然脱钩的,甚至那些与政治哲学仅有着微弱联系的理论探发,也只能被它拒之门外。相反,卢森堡的一个突出贡献则在于:她几乎没有以“政治哲学”这样的语汇来梳解马克思的理论,但她以一种不同于流俗的方式来说明马克思的理论创新与理论革命,则在实质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哲学的一种对应关系。在“整体性”的视阈里,她显然看到马克思的哲学关乎到对“最好的社会制度”、“最合理的人之生存的经济结构”等具有终极和形上意义之问题的回答,这是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散发出来的一种精神气质,这也就是卢森堡所讲到的“往前看”的理论诉求所折射出的政治哲学的欲求。在最直接的关切点上,这一政治哲学就体现为工人阶级的历史观,而在卢森堡看来,“自从马克思使工人阶级的历史观在哲学、历史和经济领域中发生作用以后,资产阶级在这些领域中的研究工作就中断了。经典意义上的自然哲学终结了,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终结了,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终结了。”<sup>②</sup>这就又回到第一方面的问题上来了(马克思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分殊与划界)。

## 二、从卢森堡的整体性辩证法到卢卡奇“总体性”的政治哲学

在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山之作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沿着卢森堡明示的“整体性”历史辩证法继续探问马克思哲学之实质的卢卡奇,通过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系统论述了“总体性”范畴。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sup>③</sup>如果说标识马克思主义根本特质的东西就是其辩证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就是要求将孤立的和导致孤立的事实以及局部的体系置放到一个总体的结构当中,根据一种整合性的、总体性的眼界来对其加以看待。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刨根究底应当是一种“总体性”的辩证法。

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Vorherrschaft),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Herrschaft),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sup>④</sup>。

若是切断卢卡奇论述的上下文,我们无法理解总体性作为一种辩证法与“历史”、“社会”以及“政治”的挂钩何以可能,进而也就无法在总体性的理论范式中推出政治哲学的论式。但卢卡奇的语境是一目

①《卢森堡文选》上卷,第403页。

②《卢森堡文选》上卷,第485页。

③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7~48页。

④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76页。

了然的:在他看来,马克思哲学的最根本使命是“改变世界”、“革命”(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开篇,卢卡奇即引征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也应当是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遵从的使命。但是,这一使命在20世纪初的西方世界里是难以被释放为现实的。具体说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务必要被识别出来:第一,发达资本主义的物质蒙蔽(即物化),使工人阶级往往只能囿限于一个历史的“当下”,从经济事实的“现在时态”来理解资本主义以及整个人类历史。于是,在物化意识的遮障面前,工人阶级看到的只是一个“被合法化”的历史终局,阶级意识、革命意识只能在极其有限的前提下才可能成为一种“真实的”主观政治性判断。第二,恩格斯晚年(甚至马克思晚年),有些教条主义的理解者,就已经开始对马克思哲学作出“经济决定论”与一般唯物主义的理解和论证。这样的理解和论证,在实际的政治后果上与物化意识“暗通款曲”,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证成为仅仅只能说明那些“可证实”的物件和现象的理论,因而它再也不可能站在历史的“后台”去揭示“我们到底需要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获得我们需要的东西”等,革命的结论再也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来。这两方面的原因合起来看,就是一个巨大的理论与实践的断裂,正像后来的萨特指出的,“把理论扔到一边,把实践扔到一边”。总体性的缺席,在卢卡奇看来显然就是这个断裂的内缘所在,所以理解资本主义以及西方革命形式时需要明察,“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sup>①</sup>

如果说,我们已经在卢卡奇的指认中发现了总体性范畴与政治哲学的一种关联,那么,这一问题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作进一步梳理。卢卡奇强调马克思哲学之总体性的意义,一方面自然基于他对马克思的解读(即他在马克思资本的研究中发现,总体性的方法始终贯穿于马克思论述的过程当中,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对马克思的阐释中将这一点抛弃了);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他对19世纪中期以来就起作用,并在20世纪早期随着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渗透而得到强化的实证主义逻辑的解读。以卢卡奇之见,马克思哲学之总体性的“覆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实证主义的肆虐才导致的结果。所以,我们也能真切地感知到,在总体性范畴提出的背后,对实证主义的警惕与回绝,正构成卢卡奇理论拷问的一个深层阿基米德点。将在这里涉及到的场境稍做放大会发现,卢卡奇的反实证主义情结,与他同时代的韦伯的理论命题及其由之引发的思想效果的刺激应当也多有干系。韦伯反对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政治文化领域中,但他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认定中,又强调要将事实与价值分离开来,以及强调要将理论的重心安放于可证实的经验对象,这实质上与风行已久的实证主义在本质上发生了合流。直接的实证主义,以及韦伯遮遮掩掩的实证主义倾向,对当代政治学、社会学的发展具有范式引导的意义。这一范式的最根本特征之一,就是在“是”之要求的前提下将规范性的、价值论的要素从理论构造中驱逐出去,以保持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无涉”。所以,在20世纪早期的西方思想语境中,对“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等的评判,往往被降格到理论研究的下位;而对“事实如何”以及“事实何以如何”等的回答,则被看作是社会科学乃至哲学研究的根本性意旨。面对这一状况,卢卡奇指证道:

经济形式的拜物教性质,人的一切关系的物化,不顾直接生产者的人的能力和可能性而对生产过程作抽象合理分解的分工的不断扩大,这一切改变了社会的现象,同时也改变了理解这些现象的方式。于是出现了“孤立的”事实,“孤立的”事实群,单独的专门学科(经济学、法律等),它们的出现本身看来就为这样一种科学研究大大地开辟了道路。因此发现事实本身中所包含的倾向,并把这一活动提高到科学的地位,就显得特别“科学”<sup>②</sup>。

在卢卡奇看来,对事实的所谓“科学的”研究,必然涉及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哲学问题,即究竟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现实”与“事实”。澄明这一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尤为重要,这是因为:“现实”与“事实”在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地位,无论怎样评价可以说都不过分,不然“唯物主义者”的名号也不会加于马克思,这一点仅通过马克思对“经济关系”、“社会结构”、“历史法则”的倚重就可以获得说明。但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6页。

②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3页。

如若不是在一个深层的思想支点上理解这一问题，反倒极有可能将本不属于马克思甚至马克思予以批驳的东西说成是马克思的创见，这不仅造成对马克思的曲解，也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畸形”发展。所以，从总体性的观察角度出发的卢卡奇，在对“现实”与“事实”的看待上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他无不忧心地指出：

不用说，对现实的一切认识均从事实出发。唯一的问题是：生活中的什么样的情况，而且是在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的情况下，才是与认识有关的事实呢？目光短浅的经验论者当然会否认，事实只有在这样的、因认识目的不同而变化的方法论的加工下才能成为事实。他认为，在经济生活中的每一个情况、每一个统计数字、每一件素材中都能找到对他说来很重要的事实。他在这样做时忘记了，不管对“事实”进行多么简单的列举，丝毫不加说明，这本身就已是一种“解释”。即使是在这里，事实就已为一种理论、一种方法所把握，已被从它们原来所处的生活联系中抽出来，放到一种理论中去了。比较老练的机会主义者，尽管本能地非常厌恶一切理论，还是很乐意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求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即自然科学通过观察、抽象、实验等取得“纯”事实并找出它们的联系的办法。他们于是用这种理想的认识方式来对抗辩证方法的强制结构<sup>①</sup>。

卢卡奇在这段话中表现出的忧虑在于，无论是经验论者还是机会主义者，在对“事实”的把握中，都是从“可计算”、“可操作”的节点出发，以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以最“科学”的方式呈现“事实”之本质，才可能符合经济理论的基本要求。但实质上，这样一种“统计和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精确的’经济理论总是落后于实际的发展”，因为以总体性的结构呈现出来的实际的历史，是一个由多种关系组合而成的复杂的系统，其发展也是一个需要从多方位加以“审读”才可能予以把握的过程。也就是说，总体性的历史结构，要求对“事实”和“现实”的理解绝不可仅仅滞留于那些“可计算”、“可操作”的节点，这是一种分离总体结构的理论“偏向”，一种“非历史性”的解读历史的模式。以这种理论模式观测到的“事实”，往往都是不具有“现实性”或者与“现实”之精神正相违背的东西。情形何以至此？

在黑格尔哲学开辟的精神圣地上吮吸汁液的卢卡奇认识到：“现实”作为一种总体性的表征，指涉到黑格尔所说的“合乎理性的”历史现象与历史活动，这从黑格尔的著名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中可以顺当地推导出来。而对“合乎理性的”历史现象与历史活动的思考和追寻，总会关联于对现实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应存性与实存性之关系的反思和回答。在对现实的理解中之所以能够看到这些关系的正反两方，在根本意义上乃是运用总体性辩证方法的一个结果。在总体性的向度内理解现实，按照卢卡奇的辨析，“似乎如此远离直接的现实，它的现实似乎构造得如此‘不科学’，但是在实际上，它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因此，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范畴。但是，这一看法的正确性，只有在我们集中注意力于我们的方法的真正物质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性时，才完全清楚地表现出来。自然科学的方法、一切反思科学(Reflexionswissenschaft)和一切修正主义的方法论理想，都拒不承认它的对象中有任何矛盾和对抗。如果尽管如此在各理论之间还是出现矛盾，那么这只是表明至今达到的认识还不够完全。似乎相互矛盾的各理论必须在这些矛盾中找到它们的限度，必须相应地加以改造，并被纳入到更一般的理论中，那时这些矛盾就会最终消失。但是我们认为，就社会的现实而言，这些矛盾并不是对现实的理解还不完全的标志，而是相反，它们密不可分的属于现实本身的本质，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它们在对总体的认识中不会被扬弃，以致停止成为矛盾。完全相反，它们将被视为必然产生的矛盾，将被视为这种生产制度的对立的基础。如果说理论作为对总体的认识，为克服这些矛盾、为扬弃它们指明道路，那是通过揭示社会发展过程的真正趋势。因为这些趋势注定要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来真正扬弃社会现实中的这些矛盾。”<sup>②</sup>卢卡奇的辨析挑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将现实作为一个总体性的结构来加以审理，现实向

<sup>①</sup>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2～53页。

<sup>②</sup>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8～59页。

我们显现出来的必然是对抗和矛盾的有机体,以及由这种对抗和矛盾所决定的发展趋势,而不是经验主义视阈中的一个一个直接的可观察、可计算、可验证的事物或现象。于是,在对现实之对抗和矛盾的把握中,理论思维的一个“至上”要求,就在于通过理性思辨的一种抽象,来分辨与确定推动与倒转历史车轮的因素,进而分辨与确定“合乎理性的”东西与现实的本质关联,最终将多数情况下隐而不现的真实的现实揭示出来。这种情况与要求在卢卡奇看来,其实就是黑格尔哲学告于后人、在马克思哲学中又得到提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信息。在一个抹杀质的改变而仅由量的增减来获得说明的物质世界和“物性化思维”中,这一思想信息的“被遮蔽”,正是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中的“肤浅”、“贫乏”、“形在神离”的一个根本因由。在这个意义上,一旦这一思想信息重新被植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理解的场境中来,那么,可能的几个结果就在于:其一,那些在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现实”的东西,则会在理论的“洞穿”下被证明为“非现实”的东西;其二,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那样,思想不仅会趋向于现实,而且会使现实趋向于它自身;其三,在有关“革命”、“阶级意识”的坐标系中得到解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会据此被证明为一种穿越那些看似最毋庸置疑、最理所当然的事实的“直观性”,从而最终为主体革命张目的理论。

这几个结果,大概就是卢卡奇以总体性来说明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时要彰明的几个重要问题。在这里,总体性对政治哲学的激活,体现为它在抗拒实证主义中展现出对政治价值的追求,从精细之处说,布洛赫所说的“希望”的那种东西,在总体性的结构中得以显现,而这种东西,与政治哲学所假定的“价值判断”或“理想追求”在本质上显然并无二致。这其实就是卢卡奇之后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建构批判理论的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尤为突出——都要去澄明的一个“同质性”的问题。

### 三、总体性:马克思政治哲学之观察的一个真实视角

当我们回过头来将卢卡奇与马克思连接起来时会发现,卢卡奇正如他自己所强调的那样,就是接着马克思来讲述总体性以及政治哲学问题的<sup>①</sup>,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比他反对的那些哲学家——如第二国际的机械唯物论者和新康德主义者——的确更为深刻,虽然他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上的刚愎自用以及过于浓重的黑格尔主义色彩使其理论话语动辄处于“被质疑”的风口浪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新版序言(1967年)中,卢卡奇的一个指认显得尤为肯定与诚恳:“毫无疑义,《历史与阶级意识》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Totalität)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sup>②</sup>深入解读马克思的文本会发现,卢卡奇讲的这一点的确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在卢卡奇总体性理论话语之背后,的确发现了通往马克思总体性以及政治哲学的一条思路,这应当是解读卢卡奇与解读马克思可以发生对接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向度了。我们的剖析如下:

马克思理解他所面对的那个时代的方式可以在多种意义上来谈,但毋庸置疑,卢卡奇所讲的整体性就是其中之一,虽然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并没有将总体性作为一个直接的理论问题进行阐述。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继承近代政治哲学的同时又超越后者一个根本性的方面。马克思与大谈抽象思维与种种意识形态吃语的德国哲学家划清界限的地方,自然首先是他对社会经济关系和历史结构的深思。但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观察社会经济关系和历史结构的时候,他眼中看到的不是一种单纯的直观的存在,毋宁说,这些事物在他的眼中被许许多多的关系所丝丝缠绕。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谈到社会生产时曾举过一个例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sup>③</sup>在这个例子中马克思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一个事物是由多种关系组合而成的(此亦谓总体性),因此在把握这个事物时不可拘泥于一种单向度的思维,拘泥于

①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2年版序言中这样说道:“我们坚持马克思的学说,决不想偏离它、改进或改正它。这些论述的目的是按马克思所理解的意思来解释、阐明马克思的学说。”(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41页。)

②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某一个环节或节点,否则把握到的只是一个“未完成的”、“不具有现实性的”事物。马克思无论多么看重生产力的要素,也比不过他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注。所以,一旦将“铁路”的例子所含射的隐喻推到社会和政治问题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就豁然开朗了。这在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上得到了验证。

如果说市民社会及其与之相连带的问题是许多近代政治哲学家(如洛克、黑格尔等)进行推论的中心之点,那么马克思之前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包括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或者公开或者隐含地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市民社会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完成了的现实”,因为它把属于现代人要去追求的那些东西,如财产权、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等一一实现出来,即使是提出要以国家的“普遍至上性”来克服市民社会之弊的黑格尔,最终也还是要为市民社会的合法性进行辩护。马克思像近代政治哲学家那样指认市民社会的历史进步性已是一个公开的事实,但马克思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将市民社会这个现代事物当作一个像卢卡奇批评的那样的既定“事实”,而是从中看到了其“完成性与未完成性”、“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矛盾,正如他在“铁路”的例子中所看到的矛盾那样。“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sup>①</sup>在这句耳熟能详的断言中,马克思说的“旧唯物主义”也就是费尔巴哈式的那种唯物主义,他之所以认为它“旧”,是因为这种唯物主义“至多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从而导向对市民社会之“完成了的现实性”的证明。但问题是,市民社会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其私有财产制度的不可自解性而不具备“完成了的现实性”,亦即,在市民社会中,对利益的攫取导致了“人被沦丧为工具”和“社会生产与生活形式普遍发生异化”,将市民社会安放在整部人类历史的多重结构中视之,它还不是黑格尔讲的“合乎理性的现实”,毋宁说,只有将市民社会推进到人类社会的阶段,这样的“合乎理性的现实”才得以完成。这就是马克思说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最直观的意义。进一步说,由“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的推进,对于志在创立新唯物主义的马克思而言,就意味着由“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递进。“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②</sup>在这句成为马克思墓志铭、也被卢卡奇在论述总体性时开篇引征的话中,“改变世界”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诉求、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对人类理想生活样态的设计等等一一囊括于其中,这大概是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新唯物主义最为实质的思想内涵了。如果有人因为《资本论》这一宏篇巨制的创作而否认这一思想内涵,并认为对“经济规律”和“历史因果关系”的突现是马克思哲学的统摄性维度,进而在“决定论”的向径内对马克思作出这样那样的解释,那么施米特的说法就尤为值得我们思考了:

由于其(指资产阶级——引注)本质存在于经济之中,马克思也得跟着走进经济王国,以便充分地从根本上理解资产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科学性来说,这其实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否能够正确地分析资产阶级并理性地把握它。这就是马克思在探究经济问题时的那种着魔般勤奋的最深层动机<sup>③</sup>。

施米特的弦外之音显然是,对资本主义釜底抽薪式的批判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大于他对“经济规律”和“历史因果关系”的说明,因而《资本论》的创作不过是他提出的“改变世界”的一种延续或者完成。施米特的理解与卢卡奇的说明不谋而合,其共同之处即在于以一种“行动主义”的眼光来审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而不是像经济决定论者或经济主义者那样在“锁定”经济事实与经济必然性中切除资本研究之政治价值关怀的维度。总体性作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在此意义上是要破除一种“当下即是”的思维范式,是要对资本的“历史性”给出一个完整性的说明,“改变世界”若是缺少这样一种理论的气节,本来具有可改变性的对象世界将变得不可改变,因为任何一种绝对的决定主义,都会制造“无时间性的永恒的假象”,一个“永恒的”、“可还原的”东西与“政治追求”和“政治实践”是难以通约的。所以,卢卡奇的下述指证不无道理:

庸俗唯物主义者,甚至披着伯恩斯坦等人的现代伪装,也没有超出再现社会生活的各种直接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2页。

③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9页。

的、简单的规定的范围。他们以为把这些规定简单地拿过来,既不对它们做进一步的分析,也不把它们融合为一个具体的总体,他们就特别“精确”了。他们只用抽象的、与具体的总体无关的规律来解释事实,事实还是抽象的孤立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Reflexionszusammenhang)中的东西。”

这种反思联系的粗率和无知,首先在于它模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它的各种规定带有适合一切社会形态的无时间性的永恒的范畴的假象。这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中表现得最明显,但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很快就步其后尘。辩证的方法被取消了,随之总体对各个环节在方法论上的优越性也被取消了;各部分不从整体来理解,相反,整体被当作不科学的东西被抛弃,或者退化成了不过是各部分的“观念”或“总合”。随着总体的被取消,各个孤立的部分的反思联系似乎就是适合一切人类社会的没有时间性的规律<sup>①</sup>。

任何历史都无法被假设,但我们可以假想:如果马克思本人看到那些追随他的人不复通过辩证的理论结构来审理资本主义机体,而只是一味地用所谓的“纯粹科学”来打通自然之物与社会之物,那么面对卢卡奇的指证,马克思定会举双手赞同。善于在多重矛盾的叠合中开掘历史之奥秘的马克思,之所以能够穿越历史、洞悉资本的真实逻辑,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将“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现在与未来”、“完成性与未完成性”、“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等诸多关系系统合到对资本主义与历史总体的理解当中,同时也在这些关系的张力场中作了极为精当的思想处理。虽然马克思几乎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对这一点进行明确说明,但他在最容易诱导庸俗唯物主义者走向褊狭的《资本论》中的一些重要论述却显然被后来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指认商品的奥秘时,马克思曾说,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这指向物的自然属性),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这指向生理学上的真理等);毋宁说,“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sup>②</sup>以自然属性背后的社会属性来说明商品形式诸链环及其内在关系,马克思的这一段论述所隐藏的重要思想信息,显然与他对于市民社会之辩证法的破解是连为一体的。从前往后看,这段论述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施米特与卢卡奇的指陈;从后往前看,卢卡奇(还有卢森堡)要去揭开的那个总体,正是在这段论述中透露出来的马克思哲学—经济学理论的总体。这个总体,最终导向的就是历史的行动主义,“改变世界”在冲破“物性”的商品研究中,不能不成为最后的归宿。

可以说,不管是从马克思自身的语境还是从卢卡奇抑或卢森堡的语境出发,我们都不难发现,总体对于马克思而言,也就意味着政治哲学或者至少是以政治哲学为底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在场。无论如何,这样一种形象的马克思哲学,我们首先是在卢森堡、卢卡奇那里开发出来的,所以,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路向来把作为政治哲学家的马克思的身影真实地复原出来,虽然在时间的意义上给人一种“倒置”的感觉,但从理论逻辑的意义来说,当下风头正劲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却需要这种“倒置”。在“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的路向上,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责无旁贷!

● 作者简介:李佃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72。

●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70”后学者学术发展计划

● 责任编辑:涂文迁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6~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9~90页。